

## 《学习有理》特别策划“思想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⑤

习近平同志  
与吴越文化

## 保境安民:吴越国延续中华文明的独特作用

本报记者 潘如龙 周宇哈 吴晔 刘俏言

## 之江会客厅

嘉宾:



张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旭烽:茅盾文学奖得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黎毓馨: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主任

当时动辄数万斤的贡茶运往北方,可测算出吴越国庞大的茶叶生产量。其与契丹之间的茶叶贸易,还促进了洲际交流,开辟了亚欧之间的茶叶之路。这些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茶叶贸易,让双方都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也为后来中国茶叶往北走向蒙古和俄罗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今天提到的万里茶道,可以说是从吴越国时期开始的。

## 文脉传承的中流砥柱

记者:吴越国崇礼重教,重视文化建设,延揽各方人士,为文化发展和文脉传承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如何看待吴越国对后世尤其是南宋以降中华文明的影响?

黎毓馨: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吴越国十分重视以文兴国,多措并举延揽天下名士。据传,吴越国内专门设置“握发殿”“择能院”以选士,钱镠还专门派画家在松江边境为南下的北人画像,从中物色人才。中原人士名流、文化精英纷至沓来,中原繁荣的文化和先进的科技也随之传入,与吴越国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建筑、工艺、文学、绘画、藏书、天文等文化现象,为唐代以来豪放、磅礴的文化风格,增添了一丝江南的内敛与婉约。

与此同时,钱氏君王重视对吴越都城特别是杭州的建设,如钱镠三次扩建杭州,浚西湖凿水并解决居民用水等,使得杭州成为北宋“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南宋临安皇城的基本格局。据史料记载,钱氏三世五王治杭期间,杭州人口明显增加,对杭州历史地位的提升和此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正是从吴越国时期,杭州这个城市从一个三等城市跃升为第一等的城市。而单从杭州自此之后对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影响来看,吴越国的贡献十分巨大。

王旭烽:我认为,重新链接起良好的中华南北文化循环交流,是吴越国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在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有些时候免不了战争和暴力,导致一些区域饱受战火摧残,文明遭遇威胁。吴越国自始至终对和平地延续着中华文脉,且文学艺术、人才教育、民俗信仰、工艺营造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都十分显著。特别是纳土归宋这一举措,并非仅仅是献上了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千八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士卒,以促成国土意义上的统一;钱镠率军包括钱氏家族族人在内的3000多人北上汴梁,还使江南文化以一种特殊而柔软的方式进入北国文化中心。这也是一种以南方生活方式为主的展开,也是一种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传播,因此更具普及性。

张刚:毫无疑问,吴越国是宋韵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源头。第一,在北宋时期,吴越国的文化风尚、饮食风气、着装风格等,已经对宋代社会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南宋期间,钱氏人才涌现,名人辈出,成文于北宋初年的《百家姓》中,“钱”姓能排在“赵”姓之后,位居第二,这是值得思考的。第二,吴越国存续期间与北宋朝廷的友好关系,三世五王对吴越地区特别是杭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归顺后两浙的高度繁荣等,可以说都对后来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有直接影响。

而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我们当下要深入挖掘和研究吴越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不能仅限于前后几十年或者几百年,还要重视“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滋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命题。换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不但是要接着讲,还要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特别要强调《钱氏家训》的现实意义。“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血算矜矜,敬老怀幼”“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等理念,不仅是钱氏后人奉为圭臬的祖训,也能为当下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一份力量。

## 海外交流的一扇窗口

记者: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与日本、朝鲜、印度和阿拉伯一些国家保持密切的经贸和文化往来,您认为吴越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怎样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形态和内涵?

张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曾经这样总结浙江文化的特质: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吴越国是一代大邦,甚至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期间中华文化对外展示和交往的重要窗口。吴越国的海外贸易继承于唐代后期,以明州(今宁波)等为主要海港,与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建立了频繁的海外贸易关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输出海外的货品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等物。从海外输入的主要有朝鲜的马匹、药材,日本的砂

金、木材,阿拉伯的火油等。为了便利海上贸易,吴越国不断创新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将原本难以在长江入海口靠岸的船只,改良成了平底沙船,船只可以直接进入钱塘江,这也间接带动了吴越国海上军事力量的提升。航海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有记载,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

吴越国将海外贸易发展到如此水平,此后两宋时期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海外贸易与交流,进一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壮大。如今,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向海图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工商皆本等发展理念和策略的形成,在我看来,与吴越国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黎毓馨:需要强调的是,吴越国的海外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兼收并蓄、相互赋能的。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一些独特的技艺和产品也随之进入吴越国。据《吴越备史》卷二《文穆王》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桶发之。水沃其焰弥盛。”火油即为石油,也称猛火油,产自阿拉伯地区,吴越国将其作为“秘密武器”。

吴越国与日本之间“经书回流”的故事也值得一提。吴越国与日本、朝鲜当时文化交流颇深。在日本奈良地区多次出土钱徽公元955年所造的阿育王塔,而在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了日本平安时代“饶益神宝”铜钱,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了朝鲜统一新罗时期的鎏金铜佛立像。据记载,最早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历经唐代会昌法难,教籍被焚毁,面临传承危机。到吴越国钱徽统治时期,天台宗高僧藏寂从日本和朝鲜半岛网罗佚失的天台教籍,获得巨大成功,为天台宗中兴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是曲线救“文”的一桩美谈。



扫一扫 看视频

## 记者手记

## 乱世中的文明担当

本报记者 潘如龙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美誉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或许有人不知道,它大致是在五代十国时开始被人传颂,而这一个时期的苏州、杭州同属于吴越国。历史地看,将苏杭相提并论的,也正是从五代十国开始的。乱世中的吴越国,成就了人间天堂,也担当起了接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角色。

“在分裂时代保护了中华文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刚说,江南文化在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南宋时期,传承了中华文脉,“而吴越国文化作为中间的一个阶段,更是在其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的张刚教授不光有大历史观,还因几度出国留学、执教,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

而在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看来,吴越国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从唐到五代,再到北宋,一以贯之。“钱镠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来考虑吴越国的生存和发展”,王旭烽说,“‘保境安民’,这是钱镠的治国方针,也是他的价值理念。”采访王旭烽过程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到她不仅有文学家的激情,还有作为历史系毕业生的严谨和理性。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频繁更替。吴越国则因稳定的政权和发达的航运,与朝鲜半岛国家、日本、印度和西亚一些国家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代表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国家进行册封。作为考古学者,浙江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黎毓馨则依据文物遗存,对吴越国当时的对外交流作了肯定。“吴越国几乎代表中国进行外交,比如加封渤海国王为‘真王’,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怀和担当。”

“现存的虎丘塔始建于959年,这已经是五代十国末期了,北方政治风云变幻,如果不是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担当,吴越国包括苏州是不会同意去造它的。”钱氏后裔、苏州吴中区文联施晓平(随母姓)说,“况且,苏州对于吴越国来说是北部前线,它一定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紧迫感。”作为我国保存得比较好的最古老砖塔之一,虎丘塔历经千年不倒,恰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文化传承性。

“钱镠的担当,还突出表现在他修建捍海石塘上”,张刚教授说,捍海石塘的修建使杭州免遭咸潮的侵袭,奠定了杭州发展的坚实基础,“它比荷兰的治水早好几百年,其重要性跟都江堰类似,甚至可以和长城、大运河一起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工程。”钱镠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开创了吴越国近百年的繁华,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6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指出,“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等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乱世中担当作为的吴越国为中华文明和浙江精神赋予了独特作用,对于吴越文化的传承和浙江精神的形塑也是功不可没。

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中华文明,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是中华民族儿女共同的骄傲。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并将“连续性”放在首位,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吴越国历经三世五王,始终奉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国”政策,在五代十国动荡不堪的乱世中,开辟了一片净土,护佑了一方百姓。更以其相对亲民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和多元的文化,赓续了中华文脉,为宋韵文化乃至更为长远的中华文明发展夯实了基础。本期我们邀请3位嘉宾,一起来探讨吴越国对延续中华文明发挥的独特作用。

## 生生不息的文明创造

记者:从公元907年钱镠被封吴越王,到公元978年钱徽纳土归宋,吴越国是五代十国中存续最久的一个政权,更成为唐宋之交的一个经济文化发展高地。请您谈谈,吴越国自身文化、科技等发展对中华文明有哪些重要贡献?

张刚:吴越国虽然存在时间不到百年,但这块地区所呈现出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其实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传统。从上山文化到良渚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些基因、特性就已经出现了。到了三皇五帝,相传大禹治水就已经到过吴越地区,越王勾践的先祖就是夏禹;吴国的第一代君主吴太伯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可见吴国和越国的土著文化既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又作为贡献者共同形塑了中华文明的特征。此后的每一个朝代,吴越地区和中原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更在分裂的时代几度保护了中华文明。就吴越国而言,前有晚唐、后有南宋,都是风雨飘摇、文明文化遭受巨大破坏的时期,而吴越国能保持一个地区相对和平而稳定的发展,本身就是给中华文脉的保护和传承打了一针“强心剂”。

如果要谈具体的成就,我个人认为,吴越国的水利技术是很值得一提的。吴越国境内江河湖海一应俱全,但地势低洼,河水入海渠道不畅,是我国海潮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钱镠在杭州主持修建捍海石塘,调集数十万军民,在钱江北岸开启了水利大会战,大大缓解了潮侵之患,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传说。吴越国时期的各种水利工程,不仅在当时遥遥领先,更折射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战天斗地的意志和精神。

王旭烽:如果从晚唐藩镇割据算起,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时空上一大动乱时期。而吴越国恰恰是在其间延续中华文明,并为之提供新鲜精神滋养的重要区域。

在这里,我主要强调吴越国的文化贡献,这种贡献是建立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的大一统国体观上的。大一统国体数千年来基本得到延续,却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严重挑战,中华大地被肢解,割据成为一种常态。而吴越国自始至终对中华民族大一统保持着捍卫的立场。这或许也源于士大夫精神对钱氏王族的渗透影响。在那个以武人烧杀抢掠为常态的时代,诸多区域出现了文明严重倒退的现象。正是把儒家文化作为主体意识形态,决定了吴越国君臣间能保持基本正常关系。从开国君主钱镠与晚唐大诗人罗隐的关系中,以往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君主对文人的私人情感与尊重,但若从五代十国特殊的文化生态来看,可知二人之间还有一种儒家文化相互渗透的关系。君主对这种关系的正向态度,也势必影响吴越国的治国理念。

黎毓馨:与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几个国家相比,吴越国遗迹遗物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珍贵性都是首屈一指的,不仅有反映物质文化的金银器、秘色瓷器、投龙银筒、玉器,还有反映精神文化的雕版印刷、雕塑艺术作品,另外碑刻也很多,类型齐全,体系完整。这些文物遗存,也成为吴越国文化、科技等方面成就的有力证明。为此,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中,强调对西湖四周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的深刻印记,“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举例来说,其一,西湖出水的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徽投龙银筒,表达了历代吴越国王祈求风雨顺时、军庶康安、兵革不兴、封境宁谧、寿筭延长、子孙隆盛、家国无忧的心愿。其二,杭州、福州等地现存的寺院和佛塔遗迹,展现了吴越国高超的建筑技术。公元964年建造的“越山吉祥禅院”(现保存华林寺单檐歇山顶大殿),是目前江南最早的木构建筑;杭州六和塔、苏州虎丘塔、台州黄岩瑞隆感应塔等都是吴越国时期所建的楼阁式砖塔,塔身都砌、外檐木构的吴越佛塔对宋代佛塔的形制、结构影响很大。其三,始

■ 2003年7月10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指出,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出的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浙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济气息……浙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

■ 2003年9月29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指出:“在西湖四周,留下了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的深刻印记,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佳话诗篇,留下了不少民族英雄的悲歌壮举,留下了许多体现杭州先民勤劳智慧的园、亭、寺、塔。可以说,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在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指导下,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共修复重建了180多处人文景点,逐渐恢复明代历史上西湖西部水域。同时,挖掘和恢复了许多西湖周边的历史文化景观,将杭州西湖的园、亭、寺、塔与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相结合,丰富了西湖风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

■ 2006年1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指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举;等等,都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 2006年5月30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作的总序中指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

(以上内容均见公开报道、公开出版物)

## 钱氏吴越国大事记

- 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  
钱镠就任镇海军节度使。
- 唐乾宁三年(公元896年)  
钱镠攻占越州,灭董昌。唐授钱镠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并两浙。
- 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  
唐敕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治所在今杭州临安县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钱镠基本统一两浙。
- 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  
钱镠筑杭州子城,征发数十万兵民,自今六和塔起至艮山门,沿钱塘江修筑捍海石塘,以防海潮。吴越国捍海石塘的兴建,保障了江浙地区的农桑经济发展和杭州的城市建设,并在后来的近千年时间里影响了钱塘江的海塘筑筑。
- 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  
钱镠置官都水营使,主管水利,招募兵士在大湖旁建部,称为“撩溪军”,有四部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湖筑堤”;还在今上海地区的吴淞江流域大搞圩田建设,在大湖流域形成了发达的圩田系统。
- 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  
后梁册封钱镠吴越国王。
- 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  
吴越国于杭州西湖“置撩兵千人,苶草浚泉”,开治理西湖专职人员之先河。  
朝鲜半岛的后百济国与高丽国交战,吴越国王钱镠派使者班尚书分别持国书至后百济和高丽,斡旋两国矛盾,体现了吴越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  
钱元瓘令曹果在涌金门外开凿大池,引入西湖水,灌入城中运河,以便舟楫航行和居民饮用。后在此建水门,称涌金门。
-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  
钱徽携缙麻以上亲属及管内官吏悉归京师开封,凡舟1044艘,主动献上所属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之地。不动兵戈,纳土归宋,政权的平稳过渡,客观上使得浙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未受影响。

(来源:浙江省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